

圣迹与霞光

——妈祖学术论坛集萃与新探

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 编

(下)

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圣迹与霞光

——妈祖学术论坛集萃与新探

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 编

(下)

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新探篇



漕运舶来的直沽妈祖文化

郭凤岐

尽人皆知,妈祖文化的发源地在福建莆田湄洲岛。妈祖原名林默,为莆田湄洲湾一名渔家女。其家紧靠大海,林默经常救人于海难。她27岁时,在救人中不幸被台风刮走(或说在湄洲岛湄洲峰“升天”)。宋徽宗宣和五年(1123年),朝廷下诏,赐其神女祠,以“顺济”为庙额。后经历代王朝多次晋封,元至元十八年(1281年),又被晋封为“天妃”,清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再被封为天后。这样,林默不仅由人变成了神,而且由民间的一个偶像,变成了亦官亦民之神,妈祖文化成了汉文化的独特文化现象。

天津市临河傍海,天后宫数量很多,据统计约有20多座;而且建立的时间比较早。湄洲岛的天后宫建于宋代,居第一位;天津最早的天后宫建于元代,列第二位;台湾最早的天后宫于明代建立,属第三位。所以有三大妈祖庙之说。天津的天后宫最著名的有两处:一在大直沽前台儿,名灵慈宫;一在三岔河口附近,名天后宫。这就是俗称的东庙、西庙。对东庙和西庙的建立时间,历来存在不同说法,有关两庙是谁建立的早,成为长期争论的问题。

对西庙建立的时间,现在天津保存最早的康熙《天津卫志》记载:“天妃宫,在本卫城东河边,元朝建。明永乐元年(1403年)重修,正统十年(1445年)参将杨节重修。”

《天津卫志》对东庙始建时间,也有说法:“灵慈宫,在河东大直沽,去城十里,元至正年建。”(此时间有误,后面详述)

又据《元史》载：元泰定三年（1326年）八月，“作天妃宫于海津镇”。《元史》这里所说的天妃宫，应该指西庙；因为大直沽之东庙，称为灵慈宫。《元史》是正史，对西庙建立的时间，是可信的。

从已掌握的史料看，东庙和西庙是天津城区的最早建筑。妈祖文化由此在天津发端，我称其为天津城市文化的原点。

从妈祖文化在莆田的诞生，到在直沽的落户，中间隔了100多年。妈祖文化是怎么样传到直沽的呢？是什么时候传过来的呢？是先传至大直沽，还是三岔河口呢？在一千余年的沧桑历史中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下面，我试图做一解析，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。

一、海上丝绸之路是妈祖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

宋代，由于连年战争，使陆路对外贸易的“丝绸之路”隔断，致使内外贸易的往来，转移到了东南沿海，出现了海上“丝绸之路”。当时的明州（今宁波）、泉州、广州等，都是大港口和海上交通枢纽。海上“丝绸之路”除了运送粮食、瓷器等货物之外，还有人口的迁移。

唐宋以后，由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原因，福建兴化（今莆田），不断有人外迁，尤其是林默的九牧林氏大家族的人，向外迁徙不断。据台湾《林氏大宗谱》记载：莆田九牧林氏族人，自唐中叶即开始向广东、闽南、浙江等地发展。明清以来，从福建移居台湾、日本和东南亚的林氏族人，更是不胜枚举。

迁徙的人们，特别是林氏族人在离开故土时，要祈祷妈祖保佑一路平安，并随身携带妈祖像或妈祖神符；当顺利到达移居地时，由于人生地不熟，会遇到各种困难，他们便以对妈祖的信仰，作为维系域外移民的精神纽带。为此，莆田等地向外迁徙的人们，所到之处便建立起妈祖庙，进行祭祀和联谊活动等，使妈祖文化传播开来。在宋代，妈祖文化形成之初，其传播范围只限于莆田、泉州及其附近地区；宋代，随着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畅通，妈祖文化的传播主要由莆田、泉州等地，沿海岸线向南传播。

到了元代，元世祖至元八年（1271年），定都大都（今北京），政治中

心由南向北转移，南北经济往来进一步加强。尤其是元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，开了海漕，朝廷所需漕粮的供应，需要由江南运到大都。随着漕运的运力大增，运输线的增长，海漕的风险也更大，妈祖文化信仰在海漕运输中，不仅得以更大发展；而且开始由莆田等地向北传播。当时，南粮北运的始点港，是江苏太仓刘家港，刘家港很快崛起为漕运的大港口。在江南的漕粮向刘家港会集中，迁徙的人们也向刘家港转移，妈祖文化也在刘家港落地。

二、刘家港是妈祖文化传入直沽的中转站

刘家港，即今之江苏太仓东浏河镇。刘家港始于南宋，兴于元代。在疆域广大的元朝，为实现它南粮北运的需要，元朝政府在短短几十年间，重修大运河，开辟海运，不断扩大海外贸易，使刘家港成为当时江南河漕和海漕的集结地。民间流传中最有传奇色彩的江南首富沈万三，当时就寓居于刘家港，并经常泛海经商。

元代的太仓刘家港，是水陆交通枢纽。这里自然资源丰富，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；这里有优良的海港码头，其“海门第一桥”宏伟气魄，站在桥上，能感觉到几十里外海潮袭来的汹涌气势；这里有繁华的商贸城，商贾云集，商品充足，船队补给容易；这里是离南京最近的临海港口，便于朝廷与船队联系；这里有东南沿海一带众多经验丰富的驾船民工和一大批优秀的“船老大”，可供挑选。元代的太仓，迅速发展成为“东南巨州”，并被誉为“六国码头”，“天下第一码头”。元明清时代的太仓的志书，对此多有记载。

最早提到太仓“六国码头”的文献，是桑悦编纂、刊于明弘治年间的《太仓州志》：“元至元十九年，宣慰朱清、张王宣，自崇明徙居太仓，创开海道漕运，而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，是以四关居民，阗肆相接，粮艘海舶，蛮商夷贾，辐辏而云集，当时谓之‘六国码头’”。

明嘉靖年间，刊印的张寅纂《太仓新志》，也记此事：“太仓，古娄县之惠安乡耳，至元朱清、张王宣创海运于此，而诸番辏集为市。国初，由此而漕定辽，由此而使西洋，遂为东南巨州。”

明崇祯年间，邑人张采纂《太仓州志》也载：“海在州城东七十里，自刘家港南，环七鸦浦北百余里，东北至崇明县二百六十里，水面两岸距四十里，外通琉球、日本诸国，故元时南关称六国码头。”

清光绪年间，王祖畬纂《太仓州志》，也有类似记载：“至元十九年朱清、张王宣自崇明徙居太仓，建海漕议，先是刘家港渐西，势日深广，王宣因道以入海，通海外番舶，蛮商夷贾，云集鳞萃，当时谓之‘六国码头’。”

从以上志书记载可知：元代至元年间，朱清、张王宣迁居太仓后，受命疏浚刘家河，并开通海道漕运。由于海运的兴盛，促进了太仓商品经济和市镇建设迅速发展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太仓由一个不满百户的村落，发展成为繁华发达的港埠码头。

元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，海漕开辟后，“天下第一码头”的刘家港，成为向直沽行海漕的始点港，海运十分繁忙。海运需要护航神，妈祖文化通过漕运由莆田传到刘家港后，于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年）在刘家港建灵慈宫，成为刘家港海漕的保护神。明清太仓志书，对此有明确记载。

明崇祯年间，张采纂《太仓州志》卷九“海运”载：海道接官厅，“在灵慈宫山门左，额曰‘景福’”，元至元二十九年万户朱旭建。

清王昶纂《直隶太仓州志》载：天后宫：“在城周泾桥北，旧名灵慈宫，元至元二十九年，海道万户朱旭建。”

太仓海运的兴盛，一直延续到明初。明永乐至宣德年间，在我国航海史上出现了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。在三十余年的时间内，郑和率领着巨大的舰队七次下西洋，历尽惊涛骇浪，飓风袭击和海寇截劫。每当遇险时，总是祈求妈祖的庇护，在史书和文物资料中都有较详细记载。郑和的船队就是从江苏太仓出发，例如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七月十一日，在“天下第一港”太仓刘家港码头，人头攒动，舰船云集。林立的桅杆上，飘舞的龙旗汇成壮观的旗海。在“天妃宫”妈祖神像前。钦差大臣郑和与当地官员，毕恭毕敬地焚香祷告。世界上第一支由200余

艘舰船、27000多名官兵所组成的庞大特混舰队，由刘家港驶向浩瀚的大海。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，妈祖文化也向海内外广泛传播。

由于海运的危险性很大，后来明朝改海漕为河槽；加之浏河泥沙淤塞，刘家港口逐渐萎缩。现今浏河水断流，在接近人海口的百米处，萎缩成一汪废弃的小溪流。当年的“天下第一港”已不复存在，只遗留下天妃宫后殿，作为浏河镇郑和纪念馆。

三、海漕船来了直沽妈祖文化

元至元十九年(1282年)，海漕开辟后，始点港是刘家港，终点港是直沽。在《新元史·朱清、张瑄传》中记载：海运创始人朱清、张瑄移居太仓，“营建第宅，开海道于直沽，粮船商舶云集于市”；以及海运到直沽经商的事。明代张采的《太仓州志》，有陈仲写的《太仓州迹序》，对此说得很清楚：“元初，朱清自崇明至太仓，开海运，通直沽，舟师货殖，通诸蛮夷，遂成万家之邑……是以官第甲于东南，税家漕户，番产贾客，云集；粮艘商舶，高樯大桅，集如林木；琳宫梵宇，朱门大宅，不可胜记。四方谓之‘天下第一码头’。”

漕运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朱清、张瑄与殷明略等，都是太仓人。为了满足元大都对粮食日益增多的需要，他们经年累月找寻从浏河到直沽，再转大都的最佳航线，在一次次等待季风、寻找黑潮暖流中，他们把40天的航线，最后能压缩到了10天。

这里所称海漕终点港的“直沽”一词，始见于《金史》。据《金史》卷一〇三《完颜佐传》记载：“完颜佐，本姓梁，初为武清县巡检。完颜咬住，本姓李，为柳口镇巡检。久之，以佐为都统，咬住副之，戍直沽寨(直沽寨至迟建于金贞祐二年(1214)前)。元代，海河(时称界河)两岸出现了“大直沽”、“小直沽”、“三汊沽”等一些地名。《元史》通常把海河流域从界河入海处至卫河(御河)和白河(潞河)汇合处的三岔河口，以及其以上卫河、白河流域，统称为“直沽”。

为什么把漕运终点港的直沽，认定为大直沽呢？据史料记载：当时小直沽、三岔河口一带，还是“荒旷斥卤”之地，而大直沽已经形成繁华

的聚落。在大直沽并建有漕粮接运厅、临清运粮万户府(军队建制)等衙署治所。大直沽成为漕运的转输中心后,据《接运海粮官王公董鲁公旧去思碑》记载:“凡运米以石计,岁三百五十万有奇,每春若夏再运,万户分命僚属焉。”由于春夏两季运量巨大,修建了直沽广通仓和武清河西务的“十四仓”等粮仓。随着漕船,还运来了浙闽江淮一带的珍货,运来了南方商人,直沽人口迅速增加,手工业和商贸业也发展起来。

对此,元人诗中多有记载。如元代傅若金的《直沽口》:“转粟春秋入,行舟日夜过。兵民杂居久,一半解吴歌”;元代王懋德的《直沽》:“极目沧溟浸碧天,蓬莱楼阁远相连。东吴转海输粳稻,一夕潮来集万船”;元代张翥(zhu)的《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寔意也》:“一日粮船到直沽,吴罌越布满街衢”;元代黄镇成的《直沽客行》:“直沽客,作客江南又江北。自从兵甲满中原,道路艰难来不得。今年却趁直沽船,黑洋大海波连天。顺风半月到闽海,只与七州通买卖。呜呼江南江北不可通,只有海船来海中。海中多风少贼徒,未知明年来得无?”此时,直沽成为漕粮的大通道;大直沽商贩云集,成为南北货物交流中心和集散地和海漕终点重镇。

随着大直沽漕运的兴盛,妈祖文化也伴随着漕船,由刘家港运到大直沽落户。在大直沽前台、面向海河建立了天妃灵慈宫。关于大直沽灵慈宫的建立时间?主要有三种意见:一说,为元至元年间(见雍正《畿辅通志》等);二说,为元延祐年间(从明代任天祚《重修敕建灵慈宫天妃碑记》推断);三说,为元至正年间(见《天津卫志》)。

我认为,大直沽灵慈宫的建立的时间,约在元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。理由是:

第一,按《畿辅通志》等旧志记载,天妃灵慈宫建于至元年间。

第二,元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,在海漕起点港太仓刘家港,建立了灵慈宫,而在海漕终点港大直沽,相对应的建立灵慈宫,是势在必行、顺理成章之举。因为所谓始点、终点的海漕,是就漕粮而说的。漕运回船也是不放空的,也要运载直沽一带北方的货物到南方,从这个意义

说,海漕实际上是双向运输,而双向出海时,都要祭拜妈祖。从祭拜妈祖的习惯说,起航时要祭拜,祈求妈祖保护航运平安;到达终点港时,还要祭拜,感谢妈祖的护佑。因此,始点、终点港,都必须建妈祖庙,祭拜妈祖。

元代危素撰《河东大直沽天妃宫旧碑》,还讲了一个妈祖救海漕危难的故事:“会覃怀逯(lu)公鲁曾以海道万户督运行海中,所乘舟触山石几被覆,乃亟踞呼天妃,俄火发桅杆,若捩(lie)其柁,遂得免;请于朝,加神封号。”

第三,刘家港与大直沽两港,不仅对应的建了妈祖庙,而且连名字都一样,都称“灵慈宫”。按元代危素撰《河东大直沽天妃宫旧碑》记载:灵慈宫“吴僧嗣庆福主之”。这就是说,大直沽灵慈宫开始的主持,是从吴地江苏而来。大直沽灵慈宫与刘家港灵慈宫关系之密切,非同一般。此外,海漕的始点港刘家港,与终点港大直沽,还互相对应,建立了漕粮的衙署“接运(官)厅”、“万户府”等,这可以说明,大直沽包括灵慈宫在内的海运的必要建筑,都是同时而建。

第四,按元代危素撰《河东大直沽天妃宫旧碑》载:大直沽天妃宫“泰定间弗戒于火”,“朝廷发官帑钱,始更作焉”。这就是说,大直沽灵慈宫在泰定年以前就已经建了,泰定年发生火灾后又重建;它不会在晚于泰定20年后的至正年才建。

危素的这个碑文,也编入了《天津卫志》,这样《天津卫志》对大直沽灵慈宫的建立时间,就有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,这是不合情理的。有人认为《天津卫志》记载的“至正年”,是“至元年”之误。我还有一个想法,就是《天津卫志》记载的至正年,也可能是大直沽灵慈宫的又一次的重修。

第五,以明人任天祚之碑文推断,大直沽灵慈宫建于延祐年,是今人的说法。任氏碑文曰:“传至延祐,兹大直沽,乃古建天妃宫”。这里的“古”字至关重要。传至延祐年的“古”,当不是延祐年,应在延祐年之前。延祐元年为1314年,其前22年为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,正好呼

应了任氏碑文中的“古”。所以由任氏碑文推断，大直沽灵慈宫的建立时间，也应为至元年间。

四、天津三岔河口天妃宫的建立

天津市的三岔河口，是漕运的转运枢纽。金章宗时，开了从独流到三岔河口的南运河，河漕南来后，经南运河到三岔河口，然后转北运河，达通州，到京都。如果行海漕，大船无法通过北运河。必须在大直沽将漕粮卸下，再换成平底船，经三岔河口达京都。三岔河口作为海漕和河漕的转运枢纽，船舶相连，繁华无比。正如元代诗人张翥在《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》中所描写：“晓日三岔口，连樯集万艘。普天均雨露，大海静波涛。”作为漕粮的转运枢纽，到这里的运粮官、船夫及移民，同样要祭拜天妃。三岔河口的天妃宫呼之欲出。

元代，朝廷在直沽进行大规模的屯田。并增设军事机构，元至大二年（1309年），于直沽设“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”，派康里军2000名驻守，又选拔汉军5000人，在直沽沿海口屯田10万顷。

在直沽的地位日趋提升的形势下，元延祐三年（1316年），朝廷于直沽设立“海津镇”，命副都指挥使伯颜镇守。关于海津镇，史料记载较少。其位置，至今不能确知。主要有两种意见，一认为在小直沽，一认为在大直沽。传说在大直沽，即今河东六号路与海河相交的地方，旧有“海津渡”，有的人认为海津镇就在这里。

但是，按照《元史》的记载：“作天妃宫于海津镇。”如果确认这里说的天妃宫就是西庙，那么海津镇也应该确认在西庙附近，即三岔河口一带。《元史》记载元代的事物，应当准确无误。

元代海津镇建立，成为直沽最高级别的、最大的军事机构。海津镇在三岔河口一带设立，这就意味着直沽的政治中心，开始由大直沽向三岔河口一带转移。因此，这里的天妃宫，便瓜熟蒂落。在海津镇建立十年后，即元泰定三年（1326年）八月诞生。

天妃宫的建立，使直沽的妈祖文化得以更大发展。它是离乡背井的人们思富的向往所在；它是从事漕运的人们乞求保护的选择；它是经

商的人们看重的理想交易场所；它是有苦有难的人们免灾求福的精神寄托；它甚至是军政官吏们祈福升迁的祭拜之处。正如张翥在《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》诗的后半阙说的：“入庙灵风肃，焚香瑞气高。使臣三拜毕，喜色满宫袍。”

由此可见，西庙的建立比东庙晚了 30 多年。但是，为什么西庙的影响却远远比东庙大呢？主要原因在于：东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 年），被八国联军洗劫而烧毁；五年后虽然重新建了大殿，但规模缩小；1951 年又被废弃，改为它用；近年才重修了天妃宫遗址博物馆，希望重振当年的人气。

再看西庙，建立后的 670 年以来，进行了数十次重修、重建，其主体建筑一直保存下来。特别是明永乐二年（1404 年），天津设卫建城后，天津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中心，由大直沽移向天津城厢一带，大直沽逐渐走向衰落。位于卫城东门外的西庙，其香火之旺，宫南宫北街，其商贸之盛，远远超过了东庙。1985 年市政府在修建古文化街时，一并修复了天后宫，使其重展了昔日风采。

以天妃宫、天妃灵慈宫为标志的津沽妈祖文化，不仅仅是一种民俗文化，它是民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融合；妈祖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文化，它是地域性文化与全球性文化的沟合；妈祖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，它是文化的多元性与商业活动的汇合；妈祖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文化，它是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结合。

妈祖文化作为天津文化的原点，在历史长河中，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为力、继发力和辐射力，发出了耀眼的光辉；今天，在建设天津现代化港口大都市中，妈祖文化一定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

（2010 年 6 月 1 日）

作者单位 天津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

妈祖文化与天津

罗春荣

元代漕运改由海运，妈祖文化北传天津后，七百多年来的南北交汇、政治重心北移和海河水域渐成京畿之地的历程，显示出天津文化的多元多彩，尤其对历史上妈祖文化的发展与成熟，占有着独特的地位，做出过突出贡献。在天津这片沃土上，有着丰富的妈祖文化遗存、相关历史典籍和珍贵资料，妈祖文化至今仍显示它强大的生命力，影响深远。

一、元代海运妈祖文化经五条线路北传天津

随着元代海运，妈祖文化传入直沽（今天津）。元初，信仰妈祖的江南船工由临安（今杭州）至大都（今北京）运送粮食和物资的路线只有一条，那就是通过京杭大运河，水旱兼行的“漕运”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这条漕运路线十分迂回艰苦。“自浙西涉江入淮，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，陆运至淇门，入御河，以达于京”（见《元史》卷九十三《食货志》一）也就是先通过江南运河到达扬州，进入淮南运河，又辗转经过高邮、淮安等地，才能驶入淮水，再经黄淮交汇处，进入黄河。从黄河北上，逆水行舟，十分艰难，也才只能到达河南境内黄河北岸的封丘线，这就是当时称作“中滦旱站”的地方。从此再经旱路，车载马驮，到达河南汲县的淇门镇，经淇河再入御河（今卫河），经直沽，过白河到通州，最终达大都。这是妈祖文化北传天津的第一条具有代表性路线。这条路线一直到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才最终废弃，运粮完全改由海运。

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海船自崇明州（同年崇明沙置

崇明州，明代崇明岛形成，今属上海市）从海道载入京师”，这便是元代海运的开始。不过这一年所运不是江南漕粮，而是南宋于临安的库藏典籍。这就是元海运最初开辟的航线。所谓“从海道载入京师”，实际上是由上海的崇明州起运，经海路直达直沽（即今天津大直沽），再经小直沽中转至大都。这便是江南吴人船工将妈祖文化传入天津的第二条线路。

元统一中国后，由于江南大批粮食物资需运往北方，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，再造平底海船六十艘，运粮四万六千余石。因为是第一次正式实施漕粮海运，经验不足，海路不熟，所以“创行海洋，沿山求岙，风信失时，明年始至直沽”。为了沿海岸近海航行，只能造吃水不深的平底海船，当然比不上深海航行的尖底海船了。只是那一年航行的时间，是从冬季开始的。不但“沿沙行驶，潮长行船，潮落抛泊”，而且受寒流影响，冒东北信风而进，逆流北上，“委实水路艰难，深为繁重”，直到第二年三月方达直沽。（参阅《新元史》·《食货志》）尽管如此，海运比起漕运“船多损坏，民亦苦之”来说，其优越性还是显而易见的。这条航线“自平江刘家港入海，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、万里长滩开洋，沿山岙而行，抵淮安路盐城县，历西海州、海宁府东海县、密州、胶州界，放灵山洋投东北，路多浅沙，行月余始抵成山。计其水程，自上海至（杨）村马头，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。”使用了九年之久。每年岁运粮之数骤增，“至元二十年，四万六千五十石。二十一年，二十九万五百石。……二十九年，一百四十石七千四百石。”（《元史》卷九十三《食货志》一）第九年的运粮数是第一年的三十倍，九年中共运粮七百一十七万八千石。于是元政府才最终决定罢止漕运，颇事海运。至元“二十八年春正月……辛酉，罢江淮漕运司，并于海船万户府，由海道漕运”。（《元史》卷十六《世祖纪》十三）这就是妈祖北传天津的第三条线路。

公元1292年，即“至元二十九年，朱清等言其路险恶，复开生道”，于是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。这条航线“自刘家港（即江苏太仓县浏河）开洋，至撑脚沙转沙嘴，至三沙、洋子江过（担）沙、大洪，又过万里

长滩，放大洋至青水洋，又经黑水洋至成山，过刘岛，至芝罘、沙门二岛，放莱州大洋，抵界河（海河）口，其道差为径直。”（《元史》卷九十三《食货志》一）。但这条航线依然不令人满意，一年后以失败告终。这是妈祖文化北传的第四条线路。

至元三十年（1293年）“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，从刘家港入海，至崇明州三沙放洋，向东行，入黑水大洋，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，又至登州沙门岛，于莱州大洋入界河”。这条航线确实近便多了，“当舟行风信有时，自浙西至京师，不过旬而已，视前二道为最便云。”如果顺风行驶，不过十天即到。这条航线也就是后来元代海运长期使用的主要航道。由于可以去深海航行，使用了吨位大的尖底海船，又“江南之粮，分为春、夏二运”，所以岁运粮数猛增，“至于天历、至顺，由四万石以上增而为三百百万以上，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”。据记载，仅天历二年（1329年）一年的岁运之数，就达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，占了首次开创航线（1282年—1291年）九年间共运粮数的一半。这条海运航线成了元政府的经济命脉，从至元三十年（1293年）开辟成功到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年）元代最后一次海运止，用了70年之久，也是妈祖文化北传天津的第五条线路。

元代海运，使妈祖文化北传天津。这也是个长时期的循序渐进过程，上述五条路线都发挥了一定作用，但主要的还是第五条长达70年的海运航线，其影响更为深远。此外，是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到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长达九年的第三条路线和元初第一条水旱兼行的“漕运路线”。二者相加其存在时间甚至超过第三条路线。

妈祖文化传入天津与大批江南船工涌入天津有直接关系。他们是妈祖虔诚信仰者，他们在“溟渤皆墓田”的大海中航行，只能“复祷天妃上海船”（臧梦麟《直沽谣》）了。妈祖便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，鼓舞他们斗狂风，战恶浪，把江南大批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运来北方，而且也把妈祖信仰带进天津，以致“直沽、平江、周泾、泉、福、兴化皆有庙”（《元史·祭祀志》）。直沽即天津，这里指大直沽立庙当在元世祖至元

年间(约1278年—1288年之间),小直沽立庙为泰定三年(1326年)“八月辛丑,作天妃宫于海津镇”(《元史》卷三十《泰定帝》二)。

妈祖文化随元代海运北传天津,为妈祖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。

二、天津妈祖文化与佛教俗文化的结合

元代崇奉佛道两教,而佛教更受朝廷重视。这是因为蒙古贵族长期崇奉藏传佛教,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,便以藏传佛教——喇嘛教为国教,一则为了安藏定边,二来也为了以喇嘛教作为控制汉民族的一种手段。尽管如此,蒙古贵族对汉传佛教也同样重视。元代诸帝出于统治需要,对佛教崇奉至极。而出于海运的需要,对妈祖也是崇奉有加。所以妈祖文化进入直沽与佛教俗文化的结合,对妈祖文化的全面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妈祖文化进入直沽后,首先把带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天妃宫,置于佛僧管理之下。元《河东大直沽天妃宫旧碑》告诉我们:“庆国利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祠,吴僧嗣庆福主之”,后来“吴僧智本主六年,以至正十一年圆寂。众请主西庙僧福聚来继其任”。元代天津大、小直沽两座天妃宫,都由江南来的和尚作住持。且东庙的和尚死了,又把西庙的和尚接来继任,天妃宫一时成了佛家的天下。于是在重修大直沽天妃宫过程中,“漕民吴中郁庆国、徐珍等,多施财,即庙前僧(福)聚创观音堂,庆国又塑观音阿罗四十余像,过者竦然为之敬畏。……钟梵鱼鼓之声盖朝夕相闻云”。

天津大直沽和小直沽天妃宫观音堂的设立,为妈祖文化与佛教俗文化的结合敞开了大门。天津为水陆要冲之地,又“杂以闽、广、吴、楚、齐、梁之民,风俗不甚纯一”(乾隆《天津府志》卷一),多元文化并存。妈祖文化传入天津,而天津民众并非都像“吴人”那样漂洋过海,只祈求妈祖海上庇佑。天津人也崇拜菩萨,也希望妈祖像菩萨那样,在生活和劳动的各个方面保佑平安。尤其是社会基层的广大妇女,在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封建伦理和传统生殖观念的重压下,又要面临随时袭来的瘟疫灾疫对儿童的摧残。在科学落后和社会无靠的情况下,她们也只

有向菩萨、妈祖祈求子嗣，并保佑母子平安。这种强烈的世俗愿望，才是促成崇拜偶像结合的动力。在天后宫同堂供奉妈祖和菩萨的基础上，开始实现她们职权上的融和。于是在天津的妈祖庙里，天妃（天后）像旁逐渐多了几位娘娘：

送生娘娘，也称“随胎送生元君”，她有两面脸，前为善相，后为恶相，据说她送胎儿投生时，便露出恶相，并拍打屁股，吓得孩子赶快投胎，出生后还哇哇大哭，屁股上还留有一块青迹。

子孙娘娘，也称“子孙保生元君”。

千子娘娘，亦称“千子元君”，身周围爬满孩子。

引母娘娘，也称“引母元君”，身旁手领一个孩子。

乳母娘娘，称作“乳母元君”，怀抱孩子，身旁还有半卧的小孩。

百子娘娘，称为“百子元君”，身上爬着许多小孩。

眼光娘娘，称作“眼光明目元君”，她手持人目，态度安详。

耳光娘娘，也称“耳光元君”，双手捧一耳形圆物。

癍疹娘娘，称作“癍疹回生元君”，左手拿有像莲蓬样的物件，上面布满斑点，表示天花。

这九位娘娘都为妈祖属下，分掌不同职权。也可视作妈祖的化身，多职多权。天津妈祖庙里的十大娘娘，闻名遐迩。满足各方要求，但也分工过细，职权重叠。于是又经精简，合并重组，形成后来的五位娘娘：天妃（天后）娘娘为首，子孙娘娘、送子娘娘、癍疹娘娘和眼光娘娘。

在妈祖身边的这四位娘娘，尤以子孙娘娘和送子娘娘为重要。而这二位娘娘又是由送子观音演化而来。早期天津咸水沽有座娘娘庙，就专祀天后圣母和送子娘娘、眼光娘娘，称为“三头娘娘”。

把送子观音搬到妈祖身边，实现了她们神权的完美结合。就这样，在广大妇女信众中，她们崇拜的是妈祖与观音的结合体——一个更为丰满而无所不能的妈祖。多少年来，妈祖也代表了人们心目中的观世音形象。这样一来，在天津妈祖形象备受青睐，到了清代一度建庙达二十余座，这在北方城市中是罕见的。